

从中西比较探究古希腊怀疑主义成因

张超

(华侨大学人文社科系, 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 怀疑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而古希腊怀疑主义是西方近代怀疑主义哲学的渊源。文章从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等三个方面进行中西之间的横向比较, 以此剖析古希腊怀疑主义的成因, 进而指出怀疑主义是推动西方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动力之一, 从另一侧面也揭示出怀疑主义的缺乏是导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陷入凝滞状态的思想原因之一。

关键词: 古希腊; 怀疑主义; 地理环境; 经济结构; 社会政治结构

中图分类号: B50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2004)04-0076-18

中国哲学渊源于先秦时代, 西方哲学则滥觞于古希腊。处于童年时代的中西哲学由于其外部物质条件的不同而使它们形成了不同的性格, 怀疑主义的强弱就是处于童年时期中西哲学“性格”的重要区别之一。这种差异伴随它们持续至今, 对中西哲学乃至中西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

怀疑主义是哲学史上一种非常独特的哲学形态,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有的专家学者把怀疑主义仅仅归结为一种狭义的怀疑论, 笔者认为这是不准确的。的确, 怀疑主义在某一时期由于人类理性的自负和狂妄而表现为对人类理性的怀疑, 即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能否认识表示怀疑和否定, 这是对理性所持的一种审慎的态度或是对理性的一种警告, 但同时怀疑主义也表现为对人类理性的尊崇, 苏格拉底和笛卡尔就是在理性处于最低谷的时候运用怀疑主义的方法拯救了理性。尽管怀疑主义常常令人沮丧不快, 但它推动西方理性哲学和理性传统发展的历史功绩却是难以磨灭的。

虽然怀疑主义在中西哲学中的普遍存在是大多数专家和学者都承认的事实, 但和古希腊怀疑主义相比, 古代中国哲学中的怀疑主义力量却相当弱小, 而且思辨性也不强, 甚至到了郭象注庄的时候, 庄子的怀疑主义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与之相反的东西。为什么怀疑主义在中西哲学中的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呢?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 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 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 越来越错综复杂, 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1]中西哲学的这一差异我们必须到社会存在中去追溯和寻找。

作为社会意识的哲学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 怀疑主义当然更是如此。但社会存在又分成若干层次。自然条件(即地理环境)是最基础的层次, 其上则有经济层次和社会组织层次。三层次彼此之间不断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进行物质的及能量的交换, 并构成一个浑然的整体, 义的生成机制和发展嬗变, 应该从地理环境、经济结构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三个层次入手加以分析和

收稿日期: 2003-12-1

基金项目: 国务院侨办科研基金(01QSK04)

作者简介: 张超(1974-), 男, 汉, 安徽肥西人, 哲学硕士, 研究方向: 古希腊哲学

研究。

一、地理环境的影响

我们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视之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基础，然而我们却常常忽略它们赖以发展的地理环境。我们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却有目共睹，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2]可见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基础确有影响，进而对反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哲学产生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尤为明显。

古希腊的地理属于开放的海洋分散型地理结构，海岸线曲折，岛屿星罗棋布，地处东西要道，海上交通十分便利；希腊半岛规模有限，贫瘠而多山，随着人口的繁衍，频繁的迁徙和流动成为必要；此外，贫瘠的土地虽不利于谷物的生长，粮食难以自给，但这里的气候温暖，适宜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的生长，农业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所有的自然条件都逼迫古希腊人必须进行海外殖民和商品交换，文化和思想上的交流也随之成为可能，而这一切又促使他们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民族。同时，希腊半岛被众多的山脉分割成若干独立的区域，爱琴海上的许多岛屿也自成一体，他们缺乏共同的经济利益，于是政治上便没有强烈的统一要求，林立的蕞尔小邦成为每个城邦公民都感到颇为心安理得的政治现状。

中国的地理属于封闭的内陆整体型地理结构，四周是古代人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这就造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同时，黄河流域土地的肥沃又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无意中又为这种相对封闭的状态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从地理环境上看，古代中国成为一个保守的农业民族似乎顺理成章。

内患外侮使华夏民族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经济利益：中国古代的黄河经常泛滥，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内建设统一的水利工程，公共管理机关的建立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已经成为必要；15 英寸的等降水量线大体上反映了游牧与农耕的边界，与 15 英寸等降水量线几乎一致的国境线向我们昭示，中国农业社会必须置于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之下。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统一的经济利益，进而造成了政治上强烈的统一要求。

另外，古希腊与古中国相比没有较大的河流，缺乏灌溉经济所具有的要求集中的刺激因素，对劳动协作性没有过高的要求，个人耕作占有重要的地位，个人和个体家庭具有较多的独立性。其次，古希腊早在荷马时代就已经向铁器时代过渡，个体家庭可以凭借先进的生产工具来满足需要，血缘社会在技术设备剧烈变革的冲击下迅速瓦解，约束个体的因素减少了。而在同时期的古代中国，由于黄河中下游缺乏对古代农具制造具有重大意义的铜矿、铁矿，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先民，在由渔猎、采集过渡到农耕时，缺乏必要的工具而无法以个体或小的群体形式生存。同时，希腊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而导致的频繁迁徙更加速了血缘力量的减弱，与其相反的古代中国，却“固土重迁”。因此在中国上古时代的传说中看到的不是血族群体的分化和解体，而是血族群体的强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大的社会群体。因此，古代的中国不象希腊，不得不带着氏族制的残余进入国家。

地理环境促使古代希腊和中国，一个开放自由，一个封闭保守；一个城邦林立，一个中央集权；一个是血缘群体的逐渐衰亡，一个是血族组织的不断强化；而这一切对双方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造成极大的差别，从而进一步对怀疑主义的生成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经济结构的影响

古希腊的商品经济使其民族转徙不定，在此过程中，不仅东地中海文明区（希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亚述、腓尼基等）内的交流日益繁盛，而且东地中海文明区与南亚文明区也早有交往。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的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爱琴海的海上贸易，逐渐脱离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卡居民之手”^[1]。古代世界的各条知识之流汇合在希腊，因此希腊人在观察认识事物时，具有比内陆农业民族宽广得多的空间观念和广阔视野，他们的认识活动突破了闭关自守的地域性，不是因循守旧，而是勇于接受新事物和新知识，冷静地比较、分析和思考就在不经意中就产生了。在那里各种传统和教条相互冲突和摩擦，很快就相互抵消了。同时存在着数以千种信仰的地方，我们往往对每一种信仰都不以为然。同时，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所孕育的平等观念也刺激了人们对旧的道德、风俗和制度的批判。那时的商人也许是第一批怀疑主义者，他们见得多了，因而对一切都不会轻易相信。

古代中国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在春秋以前是“工商食官”，基本上没有私人工商业，商业远不及希腊发达。农业民族“安土重迁”，比较闭塞，眼界狭隘，思想上趋于保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再加之难以逾越的地理上的天险，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与区外诸文明之间的联系，在公元纪年以后才逐渐发生，这几乎比东地中海文明与南亚文明之间的交往晚了整整三千年。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活动于中原一带，而不象古希腊的哲学家云游四海，他们都在同一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思想中转圈子。没有碰撞和融汇，没有冲突和摩擦，没有对比和参照，怀疑主义当然难以诞生。

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相对低下以及希腊人口的稀少，奴隶制经济应运而生。“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2]物质生活上的无忧无虑为享有思想自由创造了前提条件，一部分人获得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另外，希波战争之后，希腊的中心和学府——雅典更是获得了大量的财富，甚至苏格拉底也说过，“我的财产足够满足我的需要。”^[4]也就是说，他们无需为了生活去卖身投靠某些政治首脑。但是这仅仅只是怀疑主义产生的一个物质前提，并非有了它，就会产生怀疑主义哲学，古代中国也有一批终日饱食之士，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奢侈生活，然而怀疑主义的思潮却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掀起过一丝波澜。

更重要的是，财产的私有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古希腊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and 法律的承认，虽然财产有时可能为了城邦的利益而被充公，但这种剥夺决不像东方君主专制下那样随意。甚至在“陶片放逐法”中，被流放十年的人回到雅典后仍然能够拥有自己的财产。这种个人财产权到罗马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也正是具有这样一种传统，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弗利才会有对君主这样的告诫：君主“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只要他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那就办得到了。……但是头一件是，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5]在对财产私有的尊重和肯定的前提下，古希腊人获得了独立的人格，他们自由地思考，热烈地争辩，平等地讨论，怀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才获得了诞生的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物质条件。

“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开始的。”^[6]古代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所带来的必然是动产的贫乏和交换的不发达。同时家国同构的社会和小农经济的紧密结合，更使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无法诞生，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财产不能私有，人格便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在这里，家庭所拥有的一切财产既是私有的（相对于别的家庭而言），又是共有的（相对于大家庭即国家而言）。即使在家庭内部，家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权利，他只有看管权，而无法拥有随意的处置权。东周时期的“士”与古希腊哲学家的社会地位是截然不同的。一般的知识

分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他们“充当诸侯幕僚是正常的、至少也是正常追求的收入来源和活动机会,这种关系一直是这个等级同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区别”。^[7]知识与特定的社会阶层相融合,士人与官僚相结合,导致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士大夫。经济上的依赖性决定了学术上的政治性和附庸性,“中国思想家最大的负担,则是他们所揭橥的知识很难与朝政分离”。^[8]学术一旦与政治挂钩便会使它丧失本身应有的活力和生气,人格无法独立,对可能性和合法性进行追问的怀疑主义也因此而丧失了立身之地,所以怀疑主义不容抬头,初露端倪的反而通过博取君主的宠爱而消灭对手的思想。

另外,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古希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在“商品——货币——商品”的循环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赫拉克里特的“万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万物,正像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9]的论断,正是发达的商品交换活动在抽象思辨领域中的反映。可以说,没有一定的抽象思辨能力,怀疑主义就丧失了理论前提,无从诞生,早期的怀疑主义就是以相对主义作为其理论根基的,不具备一定的逻辑推理和演绎能力,怀疑主义既不会驳倒其他的学说,也令人难以信服。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落后于同时期的古希腊,中国哲学的抽象能力远不及希腊哲学。自然经济结构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使中国古代的哲人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事物形态和关系,表现在哲学上,多用实物代替概念,多用直观的论证代替逻辑推理,多用直接的观察说明哲学道理,或只讲结论而忽略其思维过程。西方怀疑论作为一种理性的怀疑论,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逻辑论证,而中国式的怀疑大多“则是非理性的”,^[10]常常在诗化的表达方式中走向固执、满足和沉默。

三、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

古希腊是在有了使用铁器的个体生产力,用家庭的个体生产取代原始性的集体协作生产之后,通过瓦解原始公社,发展家庭私有制经济的途径从而进入文明社会的。因此,氏族血缘关系被完全割断,社会组织完全成为地缘关系,摆脱血缘组织的个体在地缘社会中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同时,在希腊历史上,君主专制虽然是普遍存在的,但“至少从公元前 11 世纪起,这样的全民族‘神授’的政治权威就已经不再存在”。^[11]古希腊君主专制的消失跟其林立的蕞尔小邦、多次的海外殖民以及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密切相关。血缘关系的弱化和政治权威的消失为自由的思想 and 独立的思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一切思想和现实的存在都要为自己求得合法性的证明,怀疑主义自然得以生根发芽。

而在古代中国,由于生产力较之其他文明落后,公共管理职能的需要迫使我们的先民不得不带着氏族制的残余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宗法制的社会背景孕育了家国同构的形式,家长制家庭充当了中国古代专制国家的组织模式,宗法制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一体制从纵的方面看,体现为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意识,即“祖先崇拜”。“法古”、“崇圣”的癖好就是最好的证明。从横的方面看,国是“家”观念的无穷放大,政府有权干预任何家庭或个人的私事,同样家长也有权对自己家族或家庭中的任何成员施加他们认为是必要的干涉。因此,在每个个体的面前,有无数个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仅可以随时剥夺自己的财产,而且也可以随时剥夺自己所拥有一切,包括生命。在这种制度下,作为个人以及由个体组成的小家庭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6]在一个行政权力支配的社会中,最高的统治者皇帝无疑是“认识的最高权威和终极裁决者”。^[12]因此在这种环境中,西方式的怀疑主义只有死路一条。同时,宗法制与君主专制的结合,使一切都带上了伦理的色彩,人们只能在被规定的伦理范围内思考问题,因此古代中国经典式的怀疑便常常表现为停留于善恶忠奸的人伦思考。

四、结 语

综上所述, 古代中国缺乏古希腊怀疑主义的生成土壤和发展机制, 这也是造成中西文明迥异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怀疑主义对理性的批判和反思不仅推动了西方哲学的发展, 使理性主义深深扎根于沃土之中, 也促进了人类认识能力的极大提高, 并迅速摆脱了中世纪的梦魇, 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中国社会由于缺乏怀疑主义的传统, 理性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和冲动, 社会失去了应变的能力。当变化一旦强加到这个社会中的时候, 对现存秩序认同的力量就会变成狂热的卫道, 试图改变现状者立即就会粉身碎骨, 因此与西方类似的“普遍沉沦”时期在中国竟然长达二千余年。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 列宁. 列宁全集(第5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色诺芬. 经济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5] 马基雅弗利. 君主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7] 马克斯·韦伯. 儒教和道教[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8] 黄仁宇.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9] 汪子嵩, 范明生, 陈村富等. 希腊哲学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 [10] 邓晓芒. 论中西怀疑论差异[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1): 2-9
- [11] 顾准. 顾准文集[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 [12] 刘泽华. 中国的王权主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To Explore the Cause of Formation about the Ancient Greece's Skepticism from Comparing China with the West

ZHANG Chao

(School of Humanities, Quanzhou Normal College, Quanzhou, China 362000)

Abstract: Skepticism philosophy takes up the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skepticism originates from ancient Greece skepticism. The author tries to compare, between China & the west, from the geographical surroundings, economical structure and social & political structures, so as to anatomize the cause of formation about the ancient Greece's skepticism, thus to point out that skepticis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dealistic drive to push the western society forward, and also, in the other way, expose that the lack of skepticism is one of the idealistic reasons why the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has been plunged in stagnation for so long.

Key words: Ancient Greece; Skepticism; Geographical surroundings; Economical structure; Social & Political structures